

当好国有财产守护人

江苏射阳:数字赋能堵塞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流失漏洞



□本报记者 管莹
通讯员 张艺 杨毛毛

“通过数字模型快速发现案件线索,帮助追回国有财产,法律监督实现全方位的提质增效。”近日,在江苏省射阳县检察院召开的座谈会上,江苏省人大代表吴崇友点赞该院自主研发的渔业燃油补贴监督模型。“模型架构简单、易于操作,推广成效良好。”模型应用院也如是说。

一次走访引出个案

作为国家为推进油价税费改革、缓解因燃油价格上涨给渔民造成生产生活困难而出台的综合配套政策,渔业燃油补贴通常根据渔船作业方式、船长和主机功率等参数情况核算补助用油量。补助对象所从事的渔业生产应符合渔业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如有违法违规行为,扣减相应比例金额。然而,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申领对象瞒报自身受处罚情况,因监管存在漏洞致补贴款应扣减未扣减等违规领取渔业燃油补贴的问题时有发生。

2022年3月,该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检察官在一次社区走访调查中,了解到刑满释放人员徐某全额领取油价补助的相关情况。因涉及国有财产流失,在该院召开的部门联席会上,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将线索移送至公益诉讼检察部门。

经查,徐某曾在黄海某海域休渔期内非法捕捞渔获物约3000公斤,被渔政执法部门查获。法院经审理,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徐某拘役四个月,刑满释放后,徐某隐瞒其被判拘役的事实,在不符全额申报条件的情况下,违规申报并领取渔船油价补助合计11.82万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徐某领取的油价补助中,5.91万元应予追缴。

射阳县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濒临黄海,境内河流众多,渔业资源丰富,渔业是当地支柱产业之一,境内渔船数量300余艘,主管部门每年发放的渔业燃油补贴数量庞大。“违规全额领取油价补助的人可能不止徐某一个。”该院检察官思考道。但司法实践中,因“两法衔接”机制不健全,异地执法数据不共享,工作人员对申报信息开展人工核查需要耗费大量精力,这也给不法分子瞒报情况、违规领取补贴留下可乘之机。如



今年8月,江苏省射阳县检察院检察官赴渔港走访调查,就规范渔船管理、保障渔业生产安全等开展普法宣传。
孙伟摄

何全面精准高效筛查类案线索,促进燃油补贴资金精准规范发放?该院检察官将目光转向了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

数据碰撞精准锁定线索

“在传统的法律监督模式中,由于人力有限,办案往往局限于个案审查、卷宗审查。”该院检察官表示,在数字科技高速发展下,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应用成为突破人力局限的有效方式。聚焦渔业燃油补贴流失漏洞的关键处,该院研发数字模型,打破信息壁垒,汇聚数据相互碰撞。

该院检察官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以“渔船编号、非法捕捞”等为关键词筛选出涉渔刑事判决书,以“渔船信息、船主身份信息、涉案罪名、作案时间、刑罚种类”等数据要素进行数据提取,汇总形成涉渔刑事处罚信息数据库。又从政府信息公开网上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中,以“渔政、渔监”等为关键词,筛选出涉渔行政处罚决定书,以“行政处罚决定书号、渔船信息、违法主体信息、违法事实、违法时间、处罚信息”等数据要素,形成涉渔行政处罚信息数据库。进而以“渔业燃油补贴”等为关键词,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网筛选出补贴发放信息,以“渔船信息、船主身份信息、补助金额、补助时间”等数据要素,形成补贴发放信息数据库。

“关键的一步是将‘渔船编号’进行横向碰撞。将涉渔刑事处罚、行政处罚信息数据库中的‘渔船编号’数据要素,

与补贴发放信息数据库中的‘渔船编号’数据要素进行碰撞,得出违法违规渔船船主领取油价补助线索。”该院办案检察官介绍。

“三个数据库相互碰撞能精准锁定线索,更能实现违规发放补贴监督线索的自动输出。”依托该模型,该院检察官又发现了朱某、胡某等人违规申领油价补助的线索。

追回流失的国有资产

受基础数据制约,模型只能输出案件线索。但违规申领人是否真实拿到油价补助?国有资产是否真的流失?对此,该院检察官主动对接该县财政局,进一步了解油价补助实际发放情况。经查,徐某、朱某和胡某等人均违规领取了油价补助。至此,完整的证据链形成。

针对暴露出的监管漏洞,该院向行政主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建议依法追回徐某等人违规领取的油价补助,对违反禁渔法规定的行政处罚案件开展“回头看”,全面排查并追回已发放的应扣减而未扣减的油价补助。收到检察建议后,行政主管部门立即启动调查程序,将法院作出刑事判决的4艘渔船船主违规领取的24万余元补助款、因违反伏季休渔规定被行政处罚的18艘渔船船主违规领取的69万余元补助款全部追回。同时,该院主动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就相关渔业补贴政策落实情况开展座谈交流,构建共治大格局,提升法律监督

质效。“我们借助大数据模型,充分用好活既有公开数据资源,打破传统法律监督模型的地域局限性,全方位审查违规申领补贴线索,不仅节省了人力,线索锁定也更精准。”该院检察官欣喜地说。

2023年7月,该模型在全省检察机关推广。后因相关补贴政策调整,2024年,该院对模型规则进行了相应的升级调整,将搜索关键词“渔业燃油补贴”改为“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并将模型更名为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监督模型。该模型在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管理平台上架后,多地检察机关应用模型,并就进一步改进模型与该院进行沟通交流。上架至今,全国多地检察机关通过应用该模型督促挽回国有财产损失2300余万元。

今年7月,该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对2024年度符合要求的渔船资金发放情况予以公示,该院随即运用该模型对公示渔船编号进行数据碰撞,未发现新线索。

8月5日,伴随着阵阵笛鸣,射阳县黄沙港首批105艘获得专项捕捞许可的渔船率先结束伏休,解缆启航,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我们把数字检察成果经验融入日常工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监督质效,期盼黄海这片天然鱼仓能愈发丰饶,渔民们的笑容也更加灿烂动人。”渔港普法现场,该院检察官表示。

破解财产刑执行下的“隐身术”

本报讯(记者曹颖频 李敏 通讯员罗莉)“我只需将调取的相关数据导入,模型几分钟就能自动筛查出有效监督线索。”近日,四川省兴文县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在演示该院研发的财产刑“全流程”执行监督模型时,电脑屏幕上很快跳出十几条相关线索。这与过去翻阅卷宗、对表格的烦琐筛查线索过程形成鲜明对比。

该院在办案中发现,一段时期以来,财产刑刑罚的适用比例大幅上升,但却面临“执结率低、空判率高”的现实困境,财产刑强制执行力度不足,导致财产刑沦为“一纸空文”,损害了司法公信力。

在全面调研辖区内财产刑执行现状、深入分析财产刑执行内在规律和相关类案特征后,该院发现四类“卡脖子”问题:财产刑执行案件应当立案而未予立案;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应当执行而未予执行;执行案款未依法上缴国库;涉案财物应当依法处理而未予处理。围绕这四个监督点,该院进一步系统梳理发掘监督线索所需的逻辑关系和数据要素,构建监督规则,并依托四川省检察院低代码建模平台成功构建数字模型。

“传统的监督方式主要依赖人工筛查,工作量巨大。以往我们手动对比2000条数据大概需要两位检察官花费一周时间进行,即便如此还极可能遗漏监督线索。财产刑执行监督呈现碎片化、浅表化,长期面临线索发现难、实体监督难、系统治理难的痛点堵点。”该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陈丽表示。

2024年11月,该模型在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管理平台上架发布。今年5月,模型的智能化升级项目被四川省检察院确定为2025年四川省数字检察重点项目。

财产刑“全流程”执行监督模型设计的四个监督点涵盖财产刑案件立案、执行、案款缴纳、涉案财物处理等关键环节。为充分满足数据质、量两方面的需求,该院对内加强沟通,统筹协调案管部门与检察业务部门、技术部门,依托检察业务应用系统和四川省跨部门办案平台,充分挖掘涉案财物登记数据、财产刑案件生效裁判数据等内部数据资源。同步强化外部互动,与法院、公安、不动产登记中心、金融机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及财政部门等单位对接建立常态化数据获取机制。

该院在履职中运用模型发现了一条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但法院应当执行而未执行的监督线索。办案检察官立刻调阅比对法院裁判、执行记录和住房公积金等数据,发现被执行人黄某某人名下公积金账户尚余17万余元。经核查,黄某某因犯受贿、行贿等数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四个月,并处罚金35万元。判决生效后,黄某某未在指定期限内履行,法院在案款未执行到位的情况下便终结执行程序。该院迅速启动财产刑执行监督程序,向法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并在十日内收到回复。目前法院已将黄某某名下公积金账户余额予以强制执行并上缴国库。

除实现个案精准监督外,该模型还具有便捷收集数据、聚类碰撞对比信息的优势,为突破财产刑执行瓶颈提供分析基础和思路。

模型投入使用后,通过对大量线索和案件的研判,该院梳理出财产刑执行中存在的延迟立案、消极执行、涉案财物处置滞后等深层次问题,并于今年5月分别向县法院和县公安局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直指制度漏洞和工作短板。

收到检察建议后,县法院和县公安局迅速开展专题研究,进一步规范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立案和执行工作,开展涉案财物专项清理。此外,相关专项行动也同步清洗和丰富了模型数据,形成监督与治理的良性互动。

自该模型应用以来,四川省检察院指导宜宾市两级检察机关积极推进模型的升级和推广应用,助推跨区域织密财产刑执行“监督网”,现已收到北京、江西、黑龙江等多地检察机关的监督成案反馈。

从“担忧买药”到“放心问药”

北京门头沟:推动对全区62家零售药店开展“拉网式”排查



北京市门头沟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对某药店执业药师挂证情况开展调查取证。

本报讯(记者简洁)今年5月,北京市门头沟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走进该区一家药店进行回访,看到收银台旁贴着当班药师的资格证和照片。“现在大家想买什么药,都可以咨询我们的药师。”收银员指了指店内的药师说道。

原来,在该院的推动下,今年,相关行政机关已经对门头沟区62家零售药店进行了“拉网式”排查。4月,全部药店完成“人证合一”整改,药品零售环节的“挂证”乱象得到有效治理。

这一切的变化,源于12345市民热线中群众反映的“买药担忧”。作为保障群众用药安全的执业药师,在零售药店负责药品质量管理、处方审核和用药指导等工作,对避免群众用药风险、规范药品经营至关重要。今年1月,该院依托“接诉即办”机制,运用自行研发的12345数据智能分析模型,自动识别12345市民热线数据中群众反映问题所对应的检察工作,打通民生诉求直达检察监督的“高速通道”。其中,有多名群众投诉称“在药店咨询用药问题时,发现开具处方药的工作人员不专业,怀疑对方不是药师,非常担心自身的用药安全”。发现案件线索后,该院应用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管理平台上的药店执业药师人证分离监督模型,对全区62家药店的登记执业药师社保缴纳单位与执业药店信息进行碰撞对比,发现9家药店的执业药师社保信息与执业药师信息不一致,存在“挂证”嫌疑。

“挂证是指执业药师将注册证挂靠在某药店,本人却不在岗履职,导致药店销售处方药时无人审核处方、指导用药。这种‘人证分离’的乱象,直接架空了国家对处方药销售的监管红线。”该院检察官刘帅说道,“没有药师把关,处方药随便买卖,万一给患者用药错怎么办?”

今年2月,该院向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收到检察建议后,一场针对执业药师“挂证”的专项整治迅速展开,行政机关对全区62家零售药店进行“拉网式”排查,最终核对了9名药师“挂证”的违法事实并完成了督促整改。执法人员表示,此次专项行动不仅堵住了监管漏洞,更推动了药师社保数据定期比对机制,让“挂证”行为难以藏身。

“当每一张执业药师证都对应着一位真正在岗的用药指导者,当售出的每一盒处方药都经过专业审核,群众的用药安全就有了最坚实的保障。”在刘帅看来,从数字监督到机制重构,从个案办理到系统治理,守护群众“药匣子”的安全,需要司法与行政机关的同频共振,更需要对民生痛点的精准回应。“本案的终结不是终点,而是公益诉讼守护民生的新起点。”

数据“对账”揪出服刑人员养老金违规发放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王飞 永雪

“这钱确实不该拿。”8月上旬的一天,经过河南省三门峡市检察院检察官核查,一名正在服刑的人员主动退回了违规领取的3万余元养老金。这一变化,源于该院研发的涉刑参保人员养老金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发挥的作用。

养老金发放关乎社会保障制度有序运行。在办案过程中,办案检察官发现涉刑参保人员的养老金发

放涉及多部门,因存在信息壁垒,出现违规发放问题,造成国有财产流失。聚焦办案难点痛点,该院运用大数据技术打破信息孤岛,构建起跨部门的监督体系。

该模型数据主要来源于检察业务应用系统中的本地区涉刑人员生效判决数据,刑事执行检察部门掌握的监狱服刑人员、社区矫正对象、看守所服刑人员数据,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养老金发放数据等三类数据。这些数据均为结构化格式,无须复杂处理即可直接使用,基层检察院均可

便捷获取。

在模型设计上,该院针对缓刑、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等不同刑罚类型设置了差异化监督规则,通过公民身份号码关联上述三类数据,批量筛查服刑期间违规发放、待遇计算错误等问题,覆盖养老金发放全流程。不同于传统“一案一查”模式,该模型能快速锁定异常线索,显著提升监督效率。

模型研发后立即投入应用。该院通过模型比对碰撞数据,筛查出15条线索。经核实,5名罪犯在服刑期

间违规领取养老金,4名罪犯存在养老金计算错误。目前,相关问题均得到依法纠正,不仅如此,该院还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联合多部门会签数据共享与协作机制,为河南省检察机关开展相关专项治理提供了示范。

“数字检察不仅能精准发现个案问题,更能推动制度完善。”该院副检察长刘占军表示,模型的应用实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既守护了国有财产安全,也维护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权威。

纠正违法通知书接连发出后

武汉江汉:律师违规会见监督模型织密司法监督网

本报讯(记者周晶晶 通讯员付静宜 邵恒媛)“收悉《检察建议书》后,已迅速对违规委托的律师启动调查处理程序,并就辖区违规委托律师情况启动专项检查,今后将进一步强化律所管理与律师教育培训,建立协同监管长效机制。”前不久,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司法局向江汉区检察院发来书面回复,这标志着该院针对看守所违规批准律师会见同案人员开展的专项检察监督工作形成了有效闭环。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处理但实施的犯罪存在关联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

嫌疑人基本信息、共同犯罪事实等情况材料6000余份,并将纸质数据转化为电子数据,生成案犯编号表和律师会见表。电脑屏幕上,两份Excel表格并排展开:左边是案犯编号表,登记着看守所内共同犯罪嫌疑人姓名、公民身份号码、涉嫌罪名及同案编号等;右边是律师会见表,记录着近三年看守所每一次会见的律师姓名、执业证号、被会见人、案号、会见时间。基于“同案犯编号&律师名字”相等”的运算逻辑,经将两个表进行比对、去重和关联分析,几行重复数据被重点标注,检察官迅速锁定异常记录:有些同个律师的名字和执业证号竟关联着同案号案件下的不同嫌疑人,这意味着有律师违规会见了两名以上的同案人员。

“律师违规代理同案犯罪嫌疑人、违规会见两名以上同案人员,不仅损害当事人的实质辩护权益,还可能引发串供风险,影响诉讼活动顺利进行。”该院刑事执行检察部主任李平指出问题要害。

获取线索后,该院检察官立即展开核查,最终证实夏某某等5名律师在7起刑事案件中代理、会见两名以上同案犯罪嫌疑人,看守所在审查律师会见申请时存在履职不当的情形。

纠正刻不容缓。该院依法向看守所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对方高度重视,立即采纳建议并展开整改,将涉事违规律师纳入“黑名单”,在律师会见审核中增加“查询被会见人员案号”程序,筑牢审查律师会见申请的“堤坝”。

然而,堵住眼前的漏洞只是第一步。要想从根源上遏制此类违规,形成长效监督机制,就必须推动更广泛的治理。今年3月27日,该院依法向司法行政部门发出开展专项检查整治违规代理、强化律所管理责任确保执业合规、完善公检法司信息联络机制织密监督网的检察建议。

与此同时,为更有效地提高监督效率,扩大监督覆盖面,让监督从“人防”跃升到高效“技防”,该院开始探索

破题之法,决定将这次数据碰撞发现线索的经验转化为长效监督的利器。

在院党组支持下,该院刑事执行检察部的业务骨干与数字检察办公室的技术人员迅速组成攻坚团队,自主研发构建数字模型。今年4月,看守所违规批准律师会见同案人员监督模型初见雏形。

该模型首次运行,便迅速“筛”出了4名之前人工筛查未能发现的违规批准会见同案人员的律师。今年5月,该模型上架湖北省检察院大数据监督模型库。目前,该模型已在武汉市检察机关辖区内推广应用,11家基层检察院有效应用该模型,发出44份律师违规会见的纠正违法通知书,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

“这场从‘人海捞针’到‘数据织网’的监督方式变革,极大提升了监管效率和精准度,有效保障了在押人员依法获得辩护的合法权利,维护了司法活动的公正性。”该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郭艳萍说道。